

紫禁城的黎明

吴十洲 著

文物出版社

FORBIDDEN CITY AT DAWN

K. 92
98-C1

吴十洲 著



农干院 B0054624

紫禁城的黎明



单士元题



文物出版社

封面题签 单士元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道奇

责任编辑 张广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禁城的黎明/吴十洲编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9
ISBN 7-5010-1114-1

I. 紫… II. 吴… III. 故宫-通俗读物 IV. K928.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0735 号

紫禁城的黎明

吴十洲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市朝阳区安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 8.25

1998 年 9 月第一版 199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114-1/K · 448 定价: 25.00 元

序

当今博物馆学者吴十洲先生热心研究祖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之诞生及其八十年来成长之历程，以孳孳不倦治学精神，数年辛勤广罗史料分析，又采访耆老燕谈，加以参考印证，可称文献足征。益以史学卓识之长，纂成二十万言《紫禁城的黎明》大作，使人敬佩无量。不佞厕身博物院工作，已近七十年，闻见之事虽有万千，能述其原委者则百无一二。十洲先生嘱余写数语为介，自思樗栌之材，何敢序于大作之端，若赘言于末，亦非衰朽无知之叟可能相称。如方雅命，又感不恭，乃强记所知，拉杂覆陈，皆属老生常谈之言，用以塞责而已。

查紫禁城张博物院之匾额，虽始于1925年10月，而其权舆则在1914年。当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成功，肇建民国，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为1912年元月1日。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掌握军政大权的清室总理大臣袁世凯，电临时政府，宣布政见绝对赞同共和主义。2月13日孙中山先生提出辞职书于参议院，并荐袁世凯自代。2月15日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到会者十七省代表，袁世凯得十七票当选。此后袁世凯制造北京兵变，不去南京就职，3月6日允其在北京受职。4月1日，孙中山先生莅参议院行解职礼。届时袁世凯在北京行使

临时大总统职权。根据中山先生在南京议定的对清室优待条件，清室交出政权，溥仪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象征政权的外朝金銮殿，乃由民国管理。这时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氏，是一位热爱祖国传统文化者，目睹辛亥革命后，沈阳故宫、热河避暑山庄所藏历代文物，监守自盗者有之，惧文物散佚，在民国三年（1914年）乃倡议将两处陈设和库藏运至北京，在故宫武英殿、文华殿成立古物陈列所，从两处运京文物廿多万件，这是紫禁城皇宫成为博物院的开始。第二年袁世凯改民国为王朝体制，自称皇帝，年号洪宪，并有将太和殿更名承运、中和殿更名体元、保和殿更名太极之议。事未果行，只是将旧匾额满字取下，溥仪所居内廷未动，现仍保存满汉合璧之匾额，还拟以红色为新朝所尚之色，制作出嘉禾图宝座、服饰等。行将举开国大典之时，参与推翻清室的爱国将军蔡锷在云南起兵反袁，全国响应。袁世凯尚未及在皇宫登基，帝制梦只有八十三天而夭折，袁世凯抑郁而死。当时未用上的洪宪服饰等物，仍留在紫禁城中，其后古物陈列所曾经作为展品，可惜这历史短暂的遗物，早已作为废品处理，或许当有遗存，余非典守者，已不能道其详矣。

袁世凯帝制未成，却引起仍在紫禁城居住的溥仪复辟之念。忠于清室的大经学家康有为和掌握兵权的武人张勋等人，在民国六年（1917年）拥溥仪复辟。一时北京城龙旗飘扬，并任命大批官员。康有为任为弼德院副院长，院址暂在坤宁门之左，其匾额在1925年犹存。在复辟之际，掌兵权者段祺瑞与张勋有隙，在天津马厂誓师反对。复辟之梦十三天即烟消云散。当段祺瑞军队围困北京城时，康有为避居租界美森院，曾赋诗曰：“高木鸣蝉午苦暑，围城炮声密如雨。步廊搔首莫问天，下帷且校《春秋》注。”一代经学大师，在失望之际，只得校《春秋》以解愁。这次溥仪复辟

是背叛民国罪，当时民国政府大官，大都为清室遗老，将责任推到张勋身上了事。溥仪仍平安地居住在紫禁城内，但再复辟之念未释于怀，忠于清室的遗老之流，亦怂恿其间，国内由康有为游说各省督军，金梁遴选人才，英国人庄士敦进入紫禁城为溥仪英文教师，实际非请来的“家馆先生”，而是参与溥仪复辟阴谋，带有国际性变更中国国体之外忤。虽然是秘密进行，但风声早已外露。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军在推翻贿选总统曹锟之后，由其将领鹿钟麟、警察厅总监张璧、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民主革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石曾，劝请溥仪迁出紫禁城，目的是以断其用紫禁城为再复辟之根据地。报纸轰传称之为“逼宫”，其实质是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之业。此举可载入史册矣。

溥仪出宫后，由当时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宫中物品分清公私。属于公者为历代历史文物以备成立博物馆的展品，也是大公无私之事；属于私者为溥仪生活衣物钱财包括金银锭等，均由溥仪带去。又制定严密点查规章以取信于国人。清室善后委员会刚刚进入点查工作，这时北京政府政局变更，段祺瑞以执政名义掌握政权，怀念故主，由执政府秘书厅发布命令制止点查清宫物品。此令既下，点查物品事遭到挫折。在溥仪第一次举行复辟时，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表示反对，为人民所赞赏。有人举一联曰：“蔡松坡滇池起义，段合肥马厂誓师。”前一句是指蔡锷反袁世凯称帝，下一句是指段祺瑞反溥仪复辟。通过这次制止点查，有请溥仪二进宫之意。由此可知，蔡锷反袁称帝，维护民国是真，段祺瑞反溥仪复辟是假。并借“三·一八”惨案指控缔造故宫博物院元勋李石曾教授是学生游行幕后制造者，致使李教授出京避祸。1924年年底孙中山先生北上到京，清室曾向中山先生

声诉，要求政府履行优待条件。中山先生秘书处答复曰优待条件早已为清室自己废弃，清室亦无再请民国政府履行优待条件之理。清室亦无言以解。段祺瑞执政时间不长，军阀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在北京行国家元首之权，清室善后委员会又遭摧残。一位爱护博物院的社会名流江瀚叔海先生，愤而不接受聘为大学长之职。随之不久直鲁联军又进北京，干涉紫禁城事，更为粗鲁，将当时主持院务的陈垣教授逮捕。同时又将公正廉明的博物院监察员庄蕴宽先生软禁。博物院之厄运，在诞生两三年中频至。政局不定，国家之政权都在北洋军阀手中，故宫事业只是勉强维持。

1927年北伐成功，1928年国民政府正式任命易培基为院长。易氏到院之后，百废俱兴，院事出现光明。到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领土，故宫博物院在1933年将部分文物南迁，社会沸腾，出现易氏盗宝案。事属突然，院中群众既无所见，亦无所闻，易培基因此受抑含冤而死。院事遭到极大挫折。公正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在易培基含冤逝世时写一挽联曰：“最毒悍妇心，沉冤纵雪公为死；误交卖友客，闲官相攘谋竟深。”道出当时国民党一位号称元老夫妇二人，制造陷阱，致易氏于死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政协根据真实史料，印成《故宫盗宝案真相》，与吴稚晖所作挽联均系实录。1937年日本又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略我国。故宫一部分人员随文物流离西南各省，北京一部分人以留守之责，留在北京，故宫则大门一度紧闭。当时日人亦未进入故宫抢劫。其时日人气焰方张，何以如此？揆其意图在灭亡我国，北京故宫文物，已视为日本掠夺中国文物收藏之外府，而忙于军事侵略，不急于夺宝。在日本末路将临之前，北京成立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曾派人接管故宫博物院，亦无日人参与。后知其原由，是避居上海、天津一部分爱国人士知有伪

满洲国之近属，阴谋接管故宫博物院，乃请当时伪政务委员会派人接管，可避日人进入。抗战胜利，由南京政府派人接收，文物无损，只是在日本投降之前的1944年，掠走无款识的破铜缸数十。在八年日人占据中，故宫应算是幸事。方期在胜利后开展博物院事，又在三年解放战争之役中，博物院工作亦不能顺利前进。到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故宫博物院喜庆新生。紫禁城黎明之后，经历数十年，坎坷道路，随新中国，始得见旭日东升，光辉普照。博物院各类文物事业，在保管、陈列、研究、鉴定等专业人才辈出的时代里，与旧日相比，可称青出于蓝，令人欣喜。使人有患不足虞者，近年在维修紫禁城历史建筑，老一辈哲匠大都逝世，娴熟传统工艺者后继乏人。继业箕裘之人材，今日亟宜谋之。用借《紫禁城的黎明》出版之机，以告贤者。

单士元

1992年春

引 言

按照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方法，在距今一个甲子前的辛未年，一位曾经给中国的末代皇帝做过师傅的英国绅士返回自己的祖国，在那里完成了在中国皇宫里亲历的回忆录。这位英国绅士的中文名字叫庄士敦。

作为辛亥革命以后进入小朝廷，并在紫禁城生活过的惟一外国人，庄士敦有幸接触到“真龙天子”的个性与帝后生活，因此这本著作无疑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末代皇帝溥仪亲自作序，称之“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嗟夫！丧乱之余，得此目击身经之实录，信乎其可贵也。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予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①

这本书正是早为世人所知的《紫禁城的黄昏》。遗憾的是，这本书自1934年在伦敦出版之后，在很长的时期里，中国人只是间接地听到过这本书，直至近年，人们才接触到这部记述了中国末

① “序文”落款日期为辛未九月，庄士敦的注释是：辛未1931年。此序为皇上在天津时所写，由其仆从、著名诗人、政治家和书法家郑孝胥誊录。1989年3月由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紫禁城的黄昏》中译本，该序文的影印件脚注写道：1934年《紫禁城的黄昏》出版之际，爱新觉罗·溥仪亲笔题写的序文，疑为笔误。

代皇宫轶事的图书的中译本。这本书的发行以及在广大读者中所引起的强烈兴趣的事实，足以证明，在长达六十年后的今天，它的出版对于中国与中国人来讲仍然具有隽永的意义。

庄士敦在他的这本长篇回忆录中，为读者反复地描绘了一个凄楚不堪的黄昏。他写道：

随着退位诏书的颁布，清王朝的太阳落山了。黑暗的风暴给这块曾经被十个皇帝先后统治了近三百年（并不都是无效愚昧的统治）的土地，罩上了一层沉沉的夜色。但是，阳光似乎依旧眷恋着紫禁城的层楼殿宅。日落之处，我们看到的将是一片长久不逝的黄昏。^①

这一“黄昏”的内涵可以被认为是，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共和制国家，1912年初，清廷（不如说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的一个妥协的产物——被剥夺了政治权力的皇帝，仍保留着皇帝的身份和尊号，继续把持紫禁城，占据着“龙位”。它可以说是大清朝的黄昏，是帝制的黄昏。而这位来自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发源地的英国人却按捺不住对紫禁城尊严的敬慕，与对“黄昏”时分的无限眷恋。

庄士敦是1919年春天进入紫禁城，担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教师的。他这样描述了第一次进入紫禁城时的情景：

1919年3月3日，我第一次进入紫禁城。庄严肃穆的神武门，将我引进了一个空间与时间上与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过这道城门，使我不仅从共和制回到了君主制，而且从20世纪的中国倒退回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之前的古老中国。在这座门洞之外，坐落着100万

① [英]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中译本，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人口的城市，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正满怀新的希望与理想。或许万幸的是，其中许多的理想和希望，从未成为现实。这个城市正在努力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力图使自己无愧于伟大民主的首都地位。这个城市的大学中，聚集着渴望变革的学生，他们正怀着不顾一切的急切态度，将现代科学和哲学，与世界语和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一起，用来夺取过去被儒家传统和腐朽圣贤们占据的领域。这个城市的内阁部长们，在总统茶会上身着晨礼服和大礼帽露面。这个城市有一个尚未产生自己的庇特与格莱斯顿，却已装备了活动墨水瓶的议会，而且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拥有一位通过正式选举产生的议长，而这样一位议长过去从未存在。

在这同一门洞以内，可以看到四人大轿抬着像貌堂皇的官员，他们头戴镶有红宝石和珊瑚珠以及孔雀花翎的朝冠，身着前绣白鹤金雉的绸缎罩袍。高级的宫廷官员身着貂皮褂，上面带有一簇簇取自貂颈的雪白皮毛，这表明穿着者曾经受到君主的恩宠。年轻的贵族和宫廷内侍骑在马上，他们宽松的绣花礼服遮掩着鞍座与马蹬。宦官们依其等级，身着不同服饰，恭敬地侍立于一旁。穿长袍的苏拉侍候着，随时准备帮助显贵们从四抬大轿中出来，或者跨下马背，然后把他们引导到等候室中，在那里他们将按照相应的礼仪得到必不可少的一杯茶。内务府的官员审查被接见者的名单。最后，从养心殿内侧的房间，出现了一个13岁的男孩，身材削瘦，仪态文雅，衣着整肃，这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帝位的最后一位占据者，天子“万岁爷”。位于紫禁城深处的这些宫殿，与中

国的共和世界在空间上相距不啻万里之遥，断非数百步之隔；在时间上相距无异千年之久，决非共处同一时代。^①

这便是民国时代的北京城里的“国中之国”的怪现象。“在紫禁城之外，1919年是民国八年。但是对于所有能够有权通过神武门的人来说，这一年应是宣统十一年。”^②

庄士敦是《清室优待条件》的忠实维护者。他曾引用另一位西方人士的话，表达了他在紫禁城黄昏到来之前的洞察与忧虑，在他们眼里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就像一条飘零的丝质索带：

在这些骚动混乱日子里，共和国慎重地把金黄色
的丝质索带保留下来，以便将她的过去与现在捆绑在一起。也许在日后某黑暗时期里，这条索带将突然地，无可挽回地被磨破乃至撕裂。^③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终于动用武力驱逐溥仪出宫，废止了《清室优待条件》，这使庄士敦感到无比的困惑与悲戚。为此庄士敦“心里又焦急又沮丧。一方面，那个百无一用，开销巨大，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内务府被推翻了，终于垮台了，算是寿终正寝了。没有人比我更急切地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宫廷制度混乱不堪，皇帝从这种纠缠中最后出来，并不是一件可悲的事。如果这些令人高兴的事出自皇帝自己的意愿，以我一直计划和为之努力的方式而发生的，我应该感到宽慰和振奋。不幸的是，这种感觉被深深的遗憾和某种预感淹没了。事件进行的方式是有损中国和中国政

① [英]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146～147页。

② 同上，第147页。

③ 珀西瓦尔·兰登在1924年2月6日于《每日电讯》上的文章。摘自《紫禁城的黄昏》第156页。

府的信誉的，甚至也有损于那些无需承担责任的士兵，和那些盗用了政府职能的政客的信誉。我知道，这种做法会引起大批中国人的强烈不满，他们仍然忠于旧秩序，对皇位仍然尊重和敬畏，平时又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①

他又说：“我早有预料的事不幸地发生了。宫廷制度、皇帝头衔及其所属特权的废除，无论如何，不是宽宏而高尚的年轻君主的自愿行为，而是通过蛮横地使用武力实现的。使用武力的人不知道，并且也许永远不会相信，皇帝自己也急切的希望放弃这些特权。”^②

为了付给他束脩的皇帝，也为了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个人恩怨，庄士敦曾不遗余力地反对发生在1924年11月5日的事件。我们已经看到庄士敦不仅对中国政府与执行这一使命的国民军进行诋毁，而且把更强烈的仇恨集中到“基督将军”冯玉祥的身上，为此他不惜对冯玉祥进行更加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写道：

皇帝和皇后的所有结婚礼品都被1924年11月成为北京主人的士兵们和政客们攫取了，尽管民国政府曾庄严保证，皇室的私有财产不得触动。紫禁城中珍藏的财宝也被没收，其借口是均为“国家财产”。似乎，这块土地上的皇帝和他的祖先们不能以个人的资格收集艺术品。无论对于这一没收进行怎样的辩护，也不能说皇帝退位后别人慷慨送予他的结婚礼物也是合法的中国国家财产，如果以此为理由剥夺这些财产，就不能不令人耻笑了。……也许，唯一例外就是送了大喜白玉如意的那

① [英]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313页。

② 同上，第314页。

位“基督将军”。因为，当他以武力使自己成为紫禁城的主人时，他毫不费力地拿起了自己送的结婚礼品，把它还给了他曾经将它送给的那个人。^①

关于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的皇室“个人收藏”合法与否，我们将在这本书的以后的章节里予以论述；关于冯玉祥是否假革命之名，将自己变成了紫禁城的主人，又是否盗走了紫禁城内的财物等问题，也会在后来章节的陈述中真相大白。这里要提供读者的另一件史实是，与上述描写的对紫禁城的“侵犯”似乎相似，又尤甚了许多的侵扰皇宫事件，但侵扰者不是中国的士兵，而是来自所谓“文明世界”的武装人员。对此庄士敦当然也不会陌生。因为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发生在庄士敦来华的第三年，即1900年。^②

1900年6月20日凌晨5时，年已67岁的慈禧皇太后在周围簇拥的人们的反复怂恿下，终于正式下诏向各国宣战了。此后的一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前往总理衙门磋商离京事宜，途中被一名八旗兵开枪打死。射击者称是奉端王载漪之命：“凡遇外人杀之，可以求赏。”下午4时，遵照圣旨，中国军队向各国驻京使馆开火。这场由执掌大清帝国命运的最高统治集团与义和团神术相结合的针对洋人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

当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百般欺凌下，从皇太后到一般老百姓，都在虔诚地相信：焚香念咒，可以刀枪不入，可以使洋人的枪炮不响，可以使教堂立即起火，以及“红绳拽楼”、“空中掷火”、“天神下凡”等神话。然而，人们幻想中的胜利的“奇迹”，

① [英] 庄士敦：《紫禁城的黄昏》，第253～254页。

② 庄士敦是1898年来华的，曾在香港、威海卫任要职。

被八国联军的洋枪洋炮冷酷地打碎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勇士们倒在血泊之中，这一年的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进入北京各使馆。第二天，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往西安。帝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从容”地进行了一场空前野蛮的劫掠。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幕令人不堪回首的古老民族的近代悲剧！

在北京城内，侵略者各国的军队实行分区占领。表面上他们相约对紫禁城不实行占领，事实上，各国的军官们和士兵们都在利用各种机会进入紫禁城劫掠那里的财宝。当时在北京就出现了交易这些不义之财的“市场”。据日本人植松良三的记载：“至夺来之物，金银、珠玉自不必言；此外书画、骨董、衣服，以及马匹、车辆等值钱之物无论兵卒，平人，所获之数均属不少。军人因不便悉持去，虽是金银、珠玉，亦以贱值转售，以故操奇之人颇多。余见某国人购得三分大之珊瑚珠百余颗，仅一弗银耳（按：一弗，即墨西哥银一元）。”^①

法兰西人贝野罗蒂作为随军文官，乘罗督大卜战舰，和“法兰西整千整万的兵一起”，跨越地中海，于1900年9月下旬侵入中国黄海海岸，随后他亲历了一场对中国皇宫进行的空前掠夺。后来，他撰写了《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纪实》^②一书，记载了八国联军在占领北京后的一系列暴行。书中写道：“西方蛮人”占据了这个地方，“成了北京之主人翁”。八国联军的占领使“中国神秘之中心，真正的天子窠穴，宏伟的堡垒——紫禁城已成了坟墓，壕沟中堆积着尸体。”“三重城的宫殿，给人侵犯到最秘密处”，他

① [日] 植松良三：《北京战后记》，摘自《西巡回銮始末记》第3卷。

② [法] 贝野罗蒂著，李金发译：《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

们抢夺紫禁城的财物，并将这里的珍宝据为己有。当时，基督的教堂成了窝脏的据点。“教堂中的储蓄来自伟大（的），是最充实之阿里巴巴之地窖，全是从紫禁城搬来的。”“皇帝的厚丝之袍，绣着金龙的，现在委弃在地下各种杂物之中。人们在上面走，在象牙，玻璃，刺绣，珍珠上面走。”

第二年初，征服者们还用他们的方式“开放”了紫禁城。驻守皇宫的美日两国军方头目还订立了“驻京美日两国提督议定游览紫禁城章程”，兹录如下：

〔一〕此章程自西历十九日，即中历元旦日为始，照行。

〔二〕此章程因方便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入紫禁城而设，以免有屡报官中之物为游客所携失之事。此系美日两国提督会议，开定下列各条：

（一）凡文武官员，及各国士商，应持有联军各军管带之信函，准予每礼拜二、礼拜五等日，自午前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止入内，二点钟以后，应请各位退出。

（二）按前条所开之管带官之信函，应请于前两日预投，或致美提督，或致日提督。函中声明系某官居长，及应偕行人数。美日提督自当互相知会。

（三）游者应由南门入，由北门出。其余各门均不能擅开。（按第八条所开各位，不在此例）

（四）凡大内悬有免入等牌之门户，均请免入。

（五）当开明各日期时辰内，应有派出值日美日武官照料。

（六）大内所用华仆，除奉有美长官或日长官之准状外，不准带物件外出。

(七)所有华人出宫禁者，应由把门美兵日兵认真搜检。尚查有违章之物在身上，应由把门兵丁扣留，具报长官，以便申报提督核办。

(八)如瓦统帅，及联军各官长提督，及其偕来之友，不论何日，在上午十点钟至午后二点钟之间，紫禁城之南门可以启开延入。或有人持瓦大帅及联军各官长提督之名片投交守门武官，亦可放行。^①

据以上文件，起码可以得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首先，证实了紫禁城曾有过那么一次异样的“开放”的史实，开放时间启于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的某一天，即庚子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止于《辛丑条约》的签定。如果按照这一条约，八国联军应于1901年9月17日前一律撤出北京，即在此之前的某一天。开放的地点就是紫禁城，一个在伦理上拥有数以万万计的忠孝灵魂的中国皇帝的居所。开放的性质是游览，并对游览地实施法令保护，这在古老的中国无疑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是这份议定于辛丑年元旦的“章程”本身的意义。这一规则对游览手续、游览区域、游览时间等都做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无疑这一“章程”带有极大的殖民性，在很大程度上辱没了中国人民，其中享有最大特权者只是以德军统帅瓦德西伯爵为首的少数列强上层军界人员。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外国占领军与中国皇族之间的妥协，具体反映在“章程”的第四条款中。据传，清朝官员世续此间留守北京，照管宫廷事务，曾在宫中宴请联军头目，请求保护宫廷、坛庙。“章程”中并未明文规定华人不得入内，但第六、第七条款对华人出入宫禁（尤其是出宫）有非常苛刻的

① 载《西巡回銮始末记》第4卷，《庚子国变记》，第235～236页。